



辜鸿铭

国学要义

GU HONG MING

GUO XUE

YAO YI

辜鸿铭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辜鸿铭

国学要义

GU HONG MING

辜鸿铭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辜鸿铭：国学要义 / 辜鸿铭著. —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7.1

(名家国学大观 / 黄懿焯主编)

ISBN 978-7-5090-1153-9

I. ①辜… II. ①辜… III. ①国学—研究 IV.

①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4381 号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7332

发行电话：(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20 毫米 × 889 毫米 1/16

印 张：15

字 数：21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090-1153-9

定 价：42 元

目录

001-	孔教研究之一
006-	孔教研究二
015-	孔教研究之三
019-	孔教研究之四
022-	孔教研究之五
028-	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
037-	中国学（一）
044-	中国学（二）
050-	君子之道
	——写给“京报”出版商的一封信
053-	一个大汉学家
060-	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
	——读写能力和教育
064-	告准备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
071-	君子之教
078-	什么是民主
088-	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
097-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真谛
114-	东西文明异同论
124-	现代教育与战争
129-	宪政主义与中国

145-	民主与战争
151-	义利辨
158-	附：作者中译版
161-	纲常名教定国论
165-	中国古典的精髓
169-	何谓文化教养
181-	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
219-	群氓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

孔教研究之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孔子在《论语》中所谈及的，绝对是出于一个真正有修养人的经验之谈。它说明，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必须要具备怎样的精神、怎样的品质以及怎样的心态。对于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来说，他首先应当对他所研究的事物倾注所有的、无私的爱。因为人只有钟情于所学，才能懂得其所学。如今人们正在肆无忌惮地谈论那已经变得声名狼藉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体制的缺陷，然而，据我所看到的孔子的经典而言，它依然是有其不可取代的优点的。在古代传统的教育体制下，如果一个学生可以有幸成为一名真正的受教育者，那么，他必定会是一位君子，一位真正具有良好品德修养的人。当人们热衷于谈论那些被引进到中国的新的教育体系与制度时，我则在心中对其表示怀疑。理雅各博士在谈及乾隆年间计划出版的带有注解的、由很多博学的大儒参与编纂的宏大典籍时，曾经说过：“外国人不应当小看中国的博学之士——也就是中国古代塾馆里的

博学大儒们——他们自身也已证明他们对文化具有献身精神。”然而，那些新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以及那些钟情于“新体制”的知识分子——例如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并高中“状元”的现任农贸部部长张謇（张謇现在也变成了新体制的主要支持者）——对文化都已彻底丧失热情，却只对铁路、采煤、石油以及兑换业务，也就是那些可以带来现钱的东西才怀有巨大的兴趣和热情。

而那些中国古代的饱学之士，他们虽然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但却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不少高雅的情趣。他们讨厌那种大型的聚会——有茶水、点心以及饮料，在一个很大的厅堂中举行的那种大型聚会。人们从不曾听说过古代塾馆中的博学大儒们在掌声雷动、彩旗飘飘、公众云集、万人攒动的报告大厅中作报告。古代塾馆的博学大儒们只是从那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当中获取快乐；这些朋友并非是故意精心挑选的，大都是从远方慕名前来拜访的人。古代塾馆的儒生们所仰慕的人是孔子。他们对孔子进行学习研究，并尽量按照孔子的学说去身体力行。可是，他们并没有意图去建立孔子的教会，也不会自己高呼并力图让其他人也和他一起高呼“孔子！孔子！”在这些古代塾馆的儒生们眼中，儒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如同一个英国绅士在一位女士问他皈依哪种宗教时所做的回答：“一切有理性的人的宗教。”“但是，请问这样的宗教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位女士又问道。绅士回答道：“一种一切有理性的人对此所达成的默契并且决不用来谈论的宗教。”

实际上，因为引入了“新学”，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孔子在《礼记》中说过：“我听说，来和学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我从未听说过，去和教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古代塾馆的学生们所希望的只是去学习，并致力于让自己的学识和修

养不断地深厚，最终臻于完美。但“新学”所希望的只是去教导别人，仅仅去致力于所渴望阐释的一切欲望，去揭示他们发现的“新学”、体制、“信仰”、哲学、心理学以及宗教。假如古代塾馆的儒生们谈及“Erziehung”，他们会用“学问”二字去代指学习和探求。但“新学”体系下的学生们却将“Erziehung”的表达改变，他们将其称作“教育”，意思是指“教和育”。比如北京政府的教育机构如今就称作“教育部”（即教和育的机构），而不是称作学部（即学习的机构）。

也许你们要问，单单一个名字又能造成怎样的区别呢？这区别就是，古代塾馆的儒生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才能得以增长而学习，以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于是他们守着昏黄的油灯，三更灯火五更眠，去学习、研究古代传统的美德和智慧，而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学到真正的知识，并且还能拓展胸怀，以达到华兹华斯在《远行》中所描述的那种“关于天、地、人”的境界。而这正是一位真正的博学之士应该了解并具备的知识。

但“新学”体系下的学子却并不仿效此道，他并非是三更灯火五更眠，守着油灯学习古代的传统智慧与美德，而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涌到灯光明亮的孔教聚会大厅，向人们慷慨激昂地讲授如何建立起一个完美的儒家教育体系，或者到那些灯光明亮的基督教青年会聚会大厅去作报告，向人们讲述如何让每个人在社会公德方面如同作报告的人一样趋于完美！亨利·诺曼先生在其著作《新的日本》的某一章中，将日本称作“一个学校里的民族（意思就是好学的民族）”。但是对于“新的中国”而言，我担心，人们还无法将其称作一个好学的民族。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新时代的中国来说，只能说这个民族兴建了很多学校，建造了很多造价昂贵的校舍，可是这一切都只是为别人接受教育，并非让自

己真正去接受教育。

英国诗人科伯在谈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位布道士时，曾满怀激情地对主教说过如下的话：

哦，你们头戴圣冕
保护教会！可你们却没能将
同样有力的双手放在那些
既无法教又不愿学的人的头上！

在当前的中国，假如一个人想要成为改革派或共和主义宗教的布道者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有头戴圣冕的主教将双手放于他的头上，这件事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这就要看你如何看待的了。只是，因此而造成的后果是，在当今世界上，改革派及共和主义宗教的布道者早已变得参差不齐了。好的、极好的；坏的、极坏的，以及那些不好不坏的，简直就像是从小贩摊上买来的水果筐一样，缺少头戴圣冕的好主教的比率是十比一，乃至一百比一，他们从事监察及领导工作——这些没有任何才能的人，除去胆子大与脸皮厚外，基本是凭借运气才被人发觉，得以出头的。如今，和改革派与共和主义（也就是“新学”）宗教的那些胡作非为、恬不知耻的布道者相比，中国人尤其显得孤立无援，没有任何办法。据我所知，贫困的中国人一直到现在，还很难预见这所有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圣经》说“就像瞎子在引导瘸子”，孟子则言之凿凿地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在这里我想要指出的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局势，就教育来说，造成这种局势的就是如今所谓的那些新学信徒们——那些如今已经是新学的教师或将来想要成为教师的人。在这里，借一位英国诗人的话形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那些根本

就没有能力教授别人、并且自己也无志于学的人。

那些作为中国及中国人民真正朋友以及对中国的教育有兴趣的外国人应该思考一下，对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们在精神、品质以及情趣方面的熏陶，远远要比他所学习的那些实用性的知识重要。我在本文开头时引论了孔子《论语》一书中的一段话，从那里你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儒生所具备的真正精神（一位君子型儒生的精神）。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种精神：首先，他一定要对他的所学怀有无限的爱心，他也会从中找寻到真正的乐趣；其次，他一定在和他交往的那些志趣相合的朋友身上找到欢乐，而非在有茶水、点心以及饮料的大型聚会厅中寻找快乐；最后当别人认不出他或对他毫无所知的时候，他不会产生报怨。假如外国的那些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真正朋友，牢牢地记住了孔子所说的这些话，那么，当人们请求他们在教育事业上给予帮助时，他们就会去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帮助那些具备真正精神的博学之人。在当前新时代的中国，所需要的并非那所谓的焕然一新的新学、新宪法、新帽子或新靴子，而是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真正的精神、真正的君子之道，而这又恰恰和中国古语中所说一样：

“所谓道（精神），就是让万物充满生机的东西。”

孔教研究二

有子（孔子的一名弟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孔子一辈子都在强调教育教学与文化的重要性。这方面孔子与培根的观点相同，培根说过：“专业人员只能做一些局部工作或者是对其加以评断。然而总体规划以及对事情的设想和领导，最好还是让智者去做。”根据孔子的学说来看，教育自身并非目的，教育和文化应当一起为一个目的服务。一个好的学生并不单单是为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有知识的人而学习，即便是在勤奋学习的过程中，陪伴、慰藉、酬报他的那些欢乐和陶醉本身，也非主要目的。当有人对中国的成语“开卷有益”津津乐道时，程颢——这位宋代的博学大儒、严谨的孔子式的清教徒——则回应说：如果没有方法和目的，仅仅是为了从书里得到消遣的那种无计划的读书，就如同是浪费光阴，并且那种读书也会将我们的灵魂玷污。一个好学生在研习经典著作过程中的唯一目的与目标应当是：理解生活，探究人生之

道，进而懂得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如何去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

如若遵循孔子的教诲，按照他教导的那般去完善自我修养，尽力去做一名好学生，那么我们就要在孔子弟子的言谈中找到孔子学说中那些关于如何生活、如何真正地生活的真谛。而想要弄清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话，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一个问题的概念，那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而活？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教义是这样表达人类最主要的目标的：“人类之根本目的，就在于赞美上帝。”这样一种理解或许很正确，但却不够明确。在这方面，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孔子的学说是十分清晰明确并且没有任何歧义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人生之本在于孝悌）”据我来看，这恰恰正是孔子学说和别的大的宗教思想体系或者说真正的宗教（如佛教与基督教）的根本区别之处。佛教与基督教的宗旨之一是教育教导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而孔子的学说则在这上面更进一步，它教导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性公民。佛教与基督教告诫人们，如果他们想要成为一个好人，一个上帝之子，他们便只需思考灵魂的状态以及对上帝的义务，而无需思考现实社会。而儒教作为另一种学说则认为，对于保持良好的心境来说，思考灵魂的状态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与此同时还必须去思考上帝用来安置人类的社会，以便按照上帝的意愿去完成其功业。如果人们希望可以对上帝尽义务，那么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对人类尽义务，也就是孝悌的义务。实际上，宗教在原本意义上（如佛教与基督教）就是告知人们，当人们作为公民居住在这个世界上时，就无法成为一个好人。因而要想做一个好人就需要下定决心脱离现实世界，也就不再是一个公民。换句话说，原本意义上的宗教（如佛教与基督教）是这样的：为人们筹划

如何隐迹在山野荒林，同时它也是为那些在北戴河避暑的小屋中，不干其他事，而只对其灵魂状态以及对上帝的义务进行思考的人而设立的。而孔子学说中的精义却和其大相径庭。只要人们乐意，可以将其称作宗教，也可以将其称作道德体系，它告知人们作为公民应当怎样生活，也就是为那些卡莱尔说的“要纳税、付租金和有烦恼”的人而设立的宗教。

简而言之，人们可将这种孔教称作良民的宗教。可也会有人说，它压根就不是一种宗教。的确，它也许本来就不是一种宗教，我原本也承认，它并非是为那种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圣者设立的宗教。而是一种对那些纳税的、交房租的普通百姓而设立的宗教，故此它并非是一种享乐主义的宗教。正是由于它并非是为那些狂热的圣徒而设立存在的，它也就不属于那些幸运的宠儿的宗教。这种宗教里面的教徒，是没有条件在北戴河的避暑小屋中安逸地生活的。在此我想要指出的是，生活中奉行孔教的教义准则要比奉行佛教与基督教的教义要困难得多。假如有人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僧人或基督教徒，只需要举行剃度，披上袈裟，住到寺院或北戴河，在那里冥思其灵魂状态以及对上帝的义务就可以了。但是，要想变成一位优秀的孔教弟子，那就不单需要思考其灵魂状态以及对上帝的义务，而且需要思考对全人类的义务。要切实地履行责任、善行以及礼数，要像对待岳母一样地对待共和国的首领。简单地说，儒教（孔子的学说体系）就相当于孝悌的宗教，它并非是一种享乐主义的宗教。另外，我还想说明的是，虽然儒教（孔子的学说体系）不是一种灵光四射、让人疯狂的宗教。可它却与佛教和基督教一样在世界上获取了一样伟大、辉煌的成就。如同渊博的中国文化学教授罗伯特·肯纳韦·道格拉斯先生在伦敦大学说过的那样：“虽然儒教只是一种

适合于平淡而非极富冒险之胡人精神的实用性道德体系，但它却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足以让亚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居民统一在一个泱泱大国当中，而且让其生活在一种秩序与和平当中。”

在如今的中国，最让我诧异的是，那些满脑子带着“新学”来到中国的人们，却去教育那些原本就将良民宗教当成自己唯一宗教的中国民众如何去做一个良民，如何在社会道德中将自身完善；并且教育那些拥有世界上最悠久古老的历史文化的中国大众们如何去治理自己的国家。在这点上，那位前往埃及去对英国的政治家讲授应当怎样治理大英帝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但实际上人们不应当对此感到讶然，因为在如今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思想家”是那样的厚颜无耻、鄙陋不堪，然而却依然和外国人一样享有特权。但是对我们来说，事情最滑稽（或者说最可悲或其他别的什么叫法）的一面是“新学”中向一个国家的民众所展示的治国之术，这早在罗马帝国前期就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但这些所谓的博学之士，这些接受过教育的人里面的精英，这些帝国里的精神贵族们不但将这种无聊的东西提出，还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种“新学”，并且对其坚信不渝。但这在我看来，只有一千九百年前的义和团所呈现的那种扭曲的癫狂精神以及昏聩糊涂可以和其相提并论。这些东西，全是些看起来不错的装满新酒的旧酒囊饭袋，如同现在人们在中国见到的效仿欧洲人的穿着四处游荡炫耀的中国人一样。

严格地说，我认为，假如世界上还有值得中国人民需要向别的民族学习的东西，那肯定不是统治之术。英国有一句很好的谚语：“布丁的味道，只有吃了才知道。”除去古罗马，也许还能加上现在的英国，从古到今，还有哪一个民族在统治如许庞大的国家上所取得的成功、在政治统治上所获取的成功能够和中国人民的成功相媲美

呢？这里我所说的统治，自然不是指那些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议论政治以及大声吵闹之类，而是指让整个国家都处在和平和秩序当中。

既然中国人民在统治上获得了如许杰出的成就，那么其获取成就的秘密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秘密并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而是包含在这么一句看起来十分寻常的格言中：“有治人无治法。”换句话说，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在政治统治上获取如此巨大的成就，是由于他并没有在宪法上煞费心力，而是找到了统治之道的根本，可以让中国人自觉地让自己成为良民（孝悌者）。我们的那些立法人包括一切伟大的立法人不是致力于法律、法规和宪法的整治，而是依靠他们所挑选的那些适合的人。我想在这里指出，中国的帝王或者说君主的真正任务并非是统治，不是忙于细节的管理，而在于选拔出合适的人才。他先是对他们所选拔出来的人所展示的良好的精神和风范予以鼓励，并静观其变，看他们是不是拥有真正良好的精神和风范。简略地说，中国统治者或者说帝王的真正任务，不单是需要担负起培养国家公务人员良好品格的职责，而且需要担负起培养全民族良好品格的职责。实际上，对于中国官员来说，他们的任务除去管理外，更主要的是负责培养全民族良好的品格，以便让人民具备自觉的精神而非仅仅是依赖政府。歌德对什么是最好的统治形式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回答：“最好的统治形式，是让统治成为一种多余的形式。”

已故去的麦嘉温博士在他的有关中国人共同生活的描述中说过：“人们所观察到的这个民族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组织和联合能力，同时这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最明显标志之一。对他们来说，组织与联合行动十分容易。原因就在于他们内心具备一种对

权威的尊崇以及遵纪守法的本性。他们这种温驯平和并不等于那种精神衰落的、遭受阉割的驯良，而是源于一种习惯性的自制，和长期在地方、村庄或市政事务里保持着自治而出现的结果。相对于国家而言，他们更多地学会了自我依赖。如果将这个民族里那些最为贫穷以及从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带入某个荒岛上面的话，他们将能迅速地将自己组合成一个政治实体，如同那些接受过理性民主教育的人们所采取的举措一样。”

中国人治理国家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秘密就在于“有治人无治法”这个原则之中。这原则是他们所需要并为之一心一意所努力的，教化着大众，让他们遵循孝悌，而非为了制定宪法而煞费心思。另外，正如麦嘉温博士所谈及的，他们遵循孝悌之教并获得如此杰出成就，秘密同时也在于他们内心深处对权威的尊崇。而这种基本准则正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同时也是古代知识的传授与宗教（也就是中国的良民宗教）的基础。因为内心深处有一种对权威的尊崇，所以我们中国人向来拥有麦嘉温博士所声称的那种“理性民主”。起码从公元纪元的汉朝开始到民国之前的情况一直都是这样，假如我们内心深处不具备对权威的尊崇的话，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大家都知道的目前所处的“无政府状态”的共和政治下被人们称作“非理性民主”的东西。虽然中国的政治统治一直是君主政体，可我们却从未发生过专制，但现在人们却一致认为，中国的统治（一直到如今的共和时期）始终是一种独裁统治。假如一个民族拥有一种理性的民主精神，如同中国人民始终都拥有的一样，那么，专制就无法存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出现过一次专制，也就是秦始皇的暴政，他下令将书籍焚烧掉，那个时代的中华民族被那种“非理性民主”精神给吞噬了。实际上，这种“非理性民主”造成的后果——也许

算是对它的治愈——正是独裁。“非理性民主”越厉害，独裁政治就会变得越可怕。

在我看来，我们在中国是一直拥有“理性民主政体”的，虽然从统治方式上来说一直是君主统治。然而中华民族却始终是一个民主的民族。我敢这么说，就我所知，中国人（这里我所指的是真正的中国人，而非人们现在在中国大街上或政府某些机构中见到的、在打扮上模仿欧洲人的那帮人或者说是乌合之众）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真正民主的民族。著作《中国佬约翰来书》的编者英国剑桥大学的罗斯·迪金逊教授，在他的最后一本游记里写道：“以前我从未到过这样的一个国家，这里的人民是这般的自尊自立并且这般的热情。例如在美国，每个人都以为有必要对你保证一点，那就是他和你同样和善，但实际上他们却非常粗暴地对待你。但在中国却大为不同，因为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你的和善。他们不具备那种个人权利的自我意识，却又不像人们在印度随处都能看到的那种匍匐在地上的卑下胆怯。中国人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一点从他们如何对待自己以及如何对待同胞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已经达到了民主主义者一直期望西方国家所需要达到的那种标准。”也正是因为这些，我认为，现在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民主的民族。而真正的“理性”民主主义者与“非理性”的民主主义者的不同也正在于此。那些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从未想过你和他们有何差距，而那些虚伪的民主主义者则在自我意识中感觉他们的确赶不上你，却又妄图通过维护自我意识去证明他们和你同样优秀。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权利，而是自己的义务。虚伪的民主主义者则会坚守自己的权利，而不履行自己的义务。理性民主和非理性民主的本质区别也正在于此。